

陈寅恪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方法和理论特征

徐国利 李天星

摘要: 陈寅恪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品评,力求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得出许多新见解,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他在评价标准方面提出了独立与自由之标准、社会进步或发展标准、历史主义标准等;在评价方法上运用了“真了解”、方面论等。

关键词: 陈寅恪; 历史人物;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所以,历史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其中,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又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史学有着重视历史人物品评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形成了一套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和方法。陈寅恪的历史人物研究除了专门性的人物研究著述外,大多散见于其重大历史事件研究的著述中。梳理其相关思想,结合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出,他在评价标准方面提出了独立与自由之标准、社会进步或发展标准、历史主义标准等标准;在评价方法上运用了“真了解”、方面论等方法。学术界对陈寅恪这方面的史学思想缺乏专门研究,故拙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以期深化对陈寅恪史学思想和成就的认识,亦期望为当代历史人物评价提供借鉴。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

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是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问题。评价标准不同,评价的结论就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陈寅恪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 独立与自由之标准

独立与自由之标准即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学术信仰和人生追求,也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准则。王兴永说“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中,谓吾华夏民族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待历史人物如柳如是、陈端生、王国维也称其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先生史学思想之根本者,可确言也。”^①

收稿日期:2013-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S002)

作者简介:徐国利,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李天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① 王兴永《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陈寅恪对其一生最推崇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都是从这种思想高度来立论的。

陈寅恪晚年集所有精力和才思著成《柳如是别传》，此皇皇巨著是他一生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①。该书以江南名妓柳如是与钱谦益的姻缘为主线，以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为背景，对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展开研究，重点是对柳如是反清复明志节的大加表彰和才艺人格无双的高度赞扬。此书《缘起》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孌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②汪荣祖论述该书撰写缘由时说“因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自非无故。”^③可见，此书旨在表彰柳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志节。陈寅恪对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及其思想品格的评价亦以此为标准。《论〈再生缘〉》一文深入发掘《再生缘》对封建纲常的反抗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称“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④为此，他高度赞扬陈端生，称她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⑤。傅杰说“在这篇饱含感情的论文中，他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着眼，对陈端生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表彰。”^⑥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是陈寅恪最推崇的现代史家，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称王国维与自己是“风义生平师友间”^⑦。为表哀悼和追思，并阐发王氏的学术精神与人格，他先后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和《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等文。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对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和人格的着力阐发和表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⑧

(二) 社会进步或发展的标准

社会进步或发展标准，是指以历史人物能否推动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作为评价标准。陈寅恪生活在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深感社会进步和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故而，对于对社会发展或进步起过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他往往能不囿于各种成见而予以积极评价。

曹操是汉晋大变革时代的主要人物，在历史上争议很大。西晋史家陈寿称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⑨。有些史家却从封建正统论出发贬低曹操，如晋代史家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和《汉晋春秋》即是如此。尤其是元末明初以后，受《三国演义》影响，曹操被描绘为狡诈阴险

① 刘梦溪《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上），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③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④ 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6页。

⑤ 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63页。

⑥ 傅杰《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⑦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页。

⑧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6页。

⑨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的大奸臣。陈寅恪批评这种因人物小节而略其大功的做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曹操予以高度评价,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豪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这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此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①他以“求才三令”为例,指出曹操在“才性”上主张“才”重于“德”,既是其政权斗争的应变之策,也是其代表的阉宦势力夺取和巩固权力的长远之计。曹操能从历史发展大势出发,提出此“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的人才政策,“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②。

隋唐史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重点,其中对隋唐人物着墨颇多。李唐建立之初,承袭了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但武曌(武则天)立周代唐后,逐渐改变这一政策,尤其是通过进士科来破格录用人才,使原山东、江左地区的诸多人才得以出将入相,而西魏、北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的政权尊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在陈寅恪看来,“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③他还得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富,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④后世评价武则天,常以其男宠之事对其非议,陈寅恪却另发卓论。他据《李义山文集》和《旧唐书》的记载,从封建社会帝王礼制来评析,说“读史者须知武曌乃皇帝或女主,而非太后。既非太后而是皇帝,则皇帝应具备之礼制,武曌亦当备有之。区区易之、昌宗、怀义等男宠,较之唐代之皇帝后宫人数犹为寡少也。”^⑤他又以武则天混合李、武两家和维持其政治势力长久为例,以证武则天对唐代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指出“武后掌握政权,固不少重大过失,然在历史上实有进步之意义,盖北朝之局势,由此而一变也。”^⑥

(三) 历史主义的标准

历史主义的标准主要是指,将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加以评价,设身处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亦可称为“当时当地标准”^⑦。陈寅恪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多采用这一标准。

陈寅恪认为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所以出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形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杰出人物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换言之,评价历史人物时应当充分考虑形势对人物的影响。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在分析初唐统治者在东北地区采取消极策略的原因时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⑧他还重新评判了唐统治者的对外扩张,指出这不是出于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本性,而是由当时全国形势决定的,“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

①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9页。

②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1页。

③ 陈寅恪《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2页。

④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页。

⑤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0页。

⑥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1页。

⑦ 参见徐国利、李天星《中国当代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研究述评》,《军事历史》2013年第6期。

⑧ 陈寅恪《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26-327页。

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黷武开边也”^①。

陈寅恪评价历史人物坚持历史主义有一个特点,即,重视以时代风俗和道德标准为依据,又充分考虑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以后代的风习和道德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运用诗文证史、诗史互证的史学典范。他根据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道德风习来加以品评,而不是以后代的道德风习来评判人物。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移船相近邀相见”之句,宋代洪迈对此表示不满,指责白居易夜入商妇之船有伤风化。陈寅恪却不以为然,说,“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为“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并且,唐代士子有特别轻贱社会下层女子的习俗,所以,白居易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事,洪迈以宋朝礼教非议唐朝士子言行是不合时宜的^②。

当然,坚持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并不意味着将“当时当地标准”奉为金科玉律。元稹对寒女崔莺莺“始乱终弃”的行为历遭世人诟病,陈寅恪则对其重新评价,认为按唐代社会道德风习,元稹抛弃崔莺莺另娶高门韦丛无可厚非,“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③。元稹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等尽知此事,均不加措意,原因正在于此。韦丛逝后不过二年,元稹便纳妾。不过,士大夫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是唐代习俗,所以,“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④。在综合考察元稹一生的仕宦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微之因当时社会一部分尚沿袭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风,故亦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然则微之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⑤

二、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

历史人物评价除了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还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陈寅恪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主要使用了“真了解”和方面论的方法,在还原历史人物真相的基础上,不以偏概全,盲目定论,以求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一) “真了解”

陈寅恪能取得突出的史学成就获益于其治学方法的创新。“真了解”是陈寅恪治史的基本方法之一。1931年,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

① 陈寅恪《陈寅恪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31页。

②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3-54页。

③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116页。

④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2页。

⑤ 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第99页。

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这种“了解之同情”的“真了解”方法在其历史人物评价中得到充分运用。

学术界对韩愈的评价曾褒贬不一,在建国初甚至被视为“反革命”的代表,完全违背了历史真相。陈寅恪不畏当时环境之险恶,坚持“真了解”的方法,从唐代社会大背景出发,从六个方面全面评述了韩愈的历史功绩,即: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排斥佛教,匡救政俗之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他充分肯定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称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特具承先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②。汪荣祖说“这篇《论韩愈》,虽然篇幅不多,但韩愈的中心思想已纲举目张,跃于纸上,而且迭有新见。”^③如,陈氏在论及韩愈排斥佛老一事时说,韩愈的观点虽非首创,但应注意到其时代性。唐代佛教兴盛,僧徒众多,僧徒却得以免除国家赋税,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危害;道教附会唐皇室李姓得以发展,在唐初就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到玄宗时更是达到极盛,以至出现许多荒谬举措,所以,韩愈才会有排斥佛老之言论。韩愈以臣民之资格痛斥力诋佛老,显示出过人的胆识。但是,“后人昧于时代性,故不知退之言有物意有指,遂不加深察,等闲以崇正辟邪之空文视之,故特为标出如此”^④。

对于魏晋陶渊明的评价也体现了陈氏对历史人物的“真了解”。史载:“(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⑤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认为,陶渊明不仕两朝主要在于其为高逸之士,并不计较司马氏与刘氏孰得天下,不必过高推崇其品节。陈氏对此批评说:“(梁启超)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按,指沈约)之实录也。”^⑥陈氏通过对陶渊明诗的深入剖析以了解其思想,进而放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评价其思想史地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⑦这样,便对陶渊明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而限于其文学成就。

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评价也体现了“真了解”。他称“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⑧但是,世人因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政治不能绝缘而深感痛惜,认为是梁氏之不幸。陈寅恪祖孙三代皆为开明之士,与康梁变法主张虽有分歧,但同主变法;且梁启超还曾受陈三立之聘主讲时务学堂。因此,陈寅恪对梁启超有深刻的认识。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出发,分析了梁启超与政治难以绝缘之故,说“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⑨这种评价比那种简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② 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页。

③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70页。

④ 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8页。

⑤ (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三《列传·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8-2289页。

⑥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8页。

⑦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9页。

⑧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6页。

⑨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6页。

单的责备无疑要符合历史真实。

(二) 方面论

历史人物、特别是重大历史人物的活动往往是复杂和多面的,这就要求在评价他们时采用方面论的方法,对他们不同方面的历史事功和成就要分别予以评价。陈寅恪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注意使用这种方法。

东晋王导因协助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被视为开国功臣。《晋书·王导传论》把王导比作管仲、诸葛亮,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后世史家,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却对王导做相反的评价。陈寅恪对此予以批驳,再次肯定王导的历史功绩。他说,东晋初年南来北人集团领袖元帝司马睿与江东士族代表顾荣达成协定共御外侮,使赤县神州免于陆沉,奠定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而执行笼络吴地士族之政策”^①。他引《世说新语》中“政事类”和“规箴类”等文献,说明正是由于王导采取宽纵大族的旧政策,才使东晋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同时,江左的吴语为当时统治阶级之北人及江左东吴士族所同羞,王导却忍辱负重,“乃不惜屈尊为之,故宜北人名士所笑,而导之苦心可以推见也”^②。陈寅恪最后指出“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③可见,陈寅恪评价王导,不计较王导门阀政治的弊见,而是高度肯定王导笼络江东士族和统一内部,使民族得以独立和文化得以延续的历史功绩,称其为民族之功臣。对此,王永兴指出,“王鸣盛虽为清代史学名家,评王导不过以门阀骄人,可谓无识;陈寅恪先生为我国史学大师,称赞王导为吾华夏民族之功臣,可谓卓识”^④。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早年投身革命,后成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投降日本,组建汪伪政权。他由一个革命志士蜕化为卖国汉奸,应当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陈寅恪并未因其恶而否认汪精卫的文学成就。汪精卫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早年为南社成员,著有《双照楼诗词稿》等,才华可见一斑。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存仁医院养病时曾作一诗挽汪精卫^⑤,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⑥阜昌,南宋伪齐皇帝刘豫的年号。第一句,他将汪精卫与刘豫相提并论,并以《中州集》收录刘豫诗表示对汪精卫诗词的欣赏,而不以人废言^⑦;第二句,则以三国阮瑀来比喻汪精卫早年在《民报》宣传三民主义之才学。陈寅恪不因汪精卫晚年成为汉奸而否定其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其人物评价方面论方法的典型运用。

三、理论特征与学术意义

陈寅恪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和方法既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史学精神和治史方

① 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59页。

② 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1-62页。

③ 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77页。

④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8页。

⑤ 该诗最初是吴宓去医院探望陈寅恪时,由陈寅恪口述,吴宓记录下来的。“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九册,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79页)。

⑥ 陈寅恪《阜昌诗》,《陈寅恪集·诗集》,第38页。

⑦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法的体现和运用,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研究历史,是陈寅恪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所在。在他看来,文化为一个民族历史之根本所在,在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中必须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论或“中体西用论”。20世纪30年代,他在谈到外来文化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时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①他一生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1961年,吴宓到广州拜访陈氏时亦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②有学者说,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民族与文化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民族文化既是研究的对象,更是研究的视角,也就是说,是他解决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③。

这一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亦是陈寅恪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特征所在,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主要是在此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或是围绕此观念而展开的。如,他从文化的高度评价曹操“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④。他从文化融合角度重新评价了陶渊明融合儒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称其“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⑤。对寇谦之与崔浩,他从文化与种族的关系揭示了两人一喜一悲不同命运的缘由所在,即,寇谦之成功的原因,“种民礼度之义深合于儒家大族之传统学说故也”;崔浩失败的原因则是,“不顾春秋夷夏之大防,卒以此触怒鲜卑,身死族灭”^⑥。他称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⑦。对于王国维,他从“文化殉道”的角度解释其死因和重塑其形象,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⑧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此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他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他曾称中国现代学术能否独立和自由,“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⑨。在1953年那样的年代,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⑩所以,他对那些能够彰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人物尤加表彰,如王国维、柳如是、陈端生等。他颂扬王国维“文化殉道”所体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⑪。他因陈端生具有此思想,而称她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⑫。陈寅恪虽然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但是,很少写大部头的人物专著。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285页。

②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五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60页。

③ 徐梓《陈寅恪史学的民族文化特征》,《历史教学》1999年第10期。

④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9页。

⑤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9页。

⑥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57、158页。

⑦ 陈寅恪《论韩愈》,《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页。

⑧ 陈寅恪《王观堂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第12-13页。

⑨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3页。

⑩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112页。

⑪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

⑫ 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63页。

他晚年在双眼失明,却耗费全部心血来撰写《柳如是别传》,目的就在于借发掘和彰扬柳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精神理想。

陈寅恪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与方法的又一理论特征是,各种评价标准和方法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陈寅恪重视从民族和文化的立场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其主张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和发展来评价历史人物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如,他对曹操的评价,对李唐统治集团、特别是武则天的评价即是如此。究其根源,在于他持一种民族文化史观,在他看来,文化是历史的核心要素,文化能否进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陈寅恪多从文化立场来评价历史人物,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决不是偏执和僵化的,往往是与其历史评价的标准相结合的。如,其《王观堂挽词并序》提出王国维自沉是为殉其所信奉的传统文化之道。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呢?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①,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②可是,这种文化所依托的社会制度在中国近代发生了疾剧之变,使纲纪之说无所凭依。“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③。他称赞王国维的“文化殉道”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表彰王国维“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④。

然而,陈寅恪评价历史人物时又不片面执守教条和僵化的纲常伦纪标准,而是与历史主义标准相结合,对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对曹操,他突破了历史上“乱臣贼子”脸谱化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曹操的历史功绩。对白居易、元稹等,他将其放在唐代纲常伦纪的时代环境中加以评价,而不是以宋代道学家的纲常伦纪说为准绳。他突破封建伦理纲常来研究和评价人物,更表现在重视对武则天、柳如是和陈端生等女性历史人物的研究,充分发掘她们独特的历史贡献。陈寅恪称赞王国维殉道而死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他又称赞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勇于摧破“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之举体现了“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可谓“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⑤。尤其是他晚年撰写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表彰一位为封建伦理所不齿的妓女所具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品格,充分表达了他对传统男尊女卑伦理的批判。

陈寅恪所提出的“真了解”(了解之同情)的方法和方面论的方法,则是其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贯彻和运用。因为,要对历史人物“真了解”,就要将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考察和理解他们的言行,进而予以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亦即离不开历史主义的眼光。同时,要客观和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对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领域的活动和功过是非分别加以考察与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不因历史人物某方面的过与非,而掩盖历史人物其他方面的功与是,如,他对王导和汪精卫等人的评价便是很好的例证。

总之,由于陈寅恪能够站在民族和文化的高度来评价历史人物,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历史人物能否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为依据,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在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中,既主张对历史人物的“真了解”,又坚持对历史人物各方面的功过予以分

① “三纲六纪”是指“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班固《白虎通》第三卷下《三纲六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3页。)

②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第12页。

③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第13页。

④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

⑤ 陈寅恪《论〈再生缘〉》,《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66、63页。

别评价。因此,陈寅恪评价历史人物往往能不囿于成见和俗论,常发前人和他人所未发之覆,无浮泛之言,其结论亦显客观公正。陈寅恪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值得当代中国史学界认真加以总结和取鉴。

The Criteria,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Chen Yinke's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Xu Guoli, Li Tianxing

Abstract: Chen Yink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ndeavored to make comparatively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s of these figures. He drew many new conclusions that bodied forth his thoughts about historical studies.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ism are among the criteria of evaluation he proposed. In his methodology of evaluation, he insisted on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adopted a perspective approach. A systematic study of Chen Yinke's philosophy in evaluating historical figures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Chen Yinke's thoughts about historical studies and offer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modern stu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Key Words: Chen Yinke; Historical Figures; Evaluation Criteria; Evaluation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宁泊